

【研究论文】

战后日本的“德育科”设置论与道德教育体制的确立

—内藤誉三郎的道德教育主张—

佟占新（海南大学）

【摘要】 战后日本废止了修身科，实行“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又于 1958 年特设“道德课”，形成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为主、“道德课”为辅的道德教育体制。“道德课”的特设是对“德育科”的否定，而“德育科”设置论对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主要通过考察 1957 年时任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内藤誉三郎的道德教育主张及其德育观，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德育科”设置论对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形成的意义，旨在为思考当下日本道德教育改革问题提供历史的视角，并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战后；日本；道德课；德育科；内藤誉三郎

引言

战后，日本废止了 1872 年以来一直承担道德教育任务的修身科¹，实行“全面主义道德教育”²，即不设独立的道德教育学科（以下简称“德育科”），通过学校全部学科、全部教育活动开展道德教育。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历任文部大臣多次试图恢复修身科、主张设置“德育科”，但均未实现。1957 年时任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的内藤誉三郎（以下简称“内藤”）再次极力主张设置“德育科”，最终 1958 年“道德课”³被特设，自此确立了以“全面主义道

¹ 1872 年日本颁布的“学制”中主要承担道德教育任务的独立学科。

² 据笔者所见，“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尚无明确的定义，仅见“通过学校全部教育活动进行道德教育之原则”（山崎英则、片上宗二『教育用語辞典』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 年、p.133）等表述。

³ 日本 1958 年修订版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新设的领域，直至 2016 年修订版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出现“特别的学科道德”，“道德课”一直与学科、学科外活动并列出现。“道德课”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有三点：一是不设置专门的德育教师，不要求持有德育教师资格证，“道德课”由班主任负责。二是不使用教科书。“道德课”一般使用不受文部省检阅的“副读本”，并且，是否使用、使用何种“副读本”由校长和教师决定，学校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三是不进行课业成绩考核和评价。

德教育”为主、“道德课”为辅的战后道德教育体制。2015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将“道德课”改为“特别的学科道德”，小学2018年4月、中学2019年4月正式开课。历经60年，“道德课”最终退场，取而代之“德育科”重新登场。日本的“道德学科化”⁴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战后日本有关道德教育问题的讨论中也一直存在设置“德育科”的主张，可以说“道德学科化”问题由来已久。

笔者认为，反观历史是了解当下的有效手段。20世纪50年代就有观点认为内藤是设置“德育科”的实际推动者。⁵他为何要积极主张设置“德育科”，其道德教育主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有关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众多，但论及内藤的成果较少，虽有研究探讨他在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基准和授课学时等制度化方面发挥的作用⁶，但未对其道德教育主张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在简述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内藤的“德育科”主张，分析其德育观，旨在为我们思考当代日本道德教育改革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经验。

1. 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确立

1945年12月31日，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GHQ/SCAP）发布“关于停止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学科授课”的指令，三学科被叫停。此后日本地理和历史分别于1946年7月和10月重新开课，而修身科却未曾再开，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修身科被废止，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对战前道德教育的反省。GHQ/SCAP指令下达之前，文部省在1945年11月初就设置了由学者和文部省各局、科长等组成的“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反思战前道德教育的弊端，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战后道德教育问题。最终，“公民教育刷新委员会”提出：“修身必须与公民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⁷随即文部省于1946年5月7日发布《关于实施公民教育的通知》，提出通过公民

⁴ “道德学科化”是指将1958年特设的非正式学科“道德课”改为与国语、算数、社会等学科同等的学科。

⁵ 安達拓二「内藤誉三郎という男」、『教育評論』(11) 1957年 pp. 11-12。

⁶ 大森直樹『道德教育と愛国心』岩波書店 2018年 pp. 209-233。

⁷ 片上宗二『敗戦直後の公民教育構想教育』、史料出版会 1984年 p. 243。

科实施道德教育。文部省虽在通知中明确指出：“该通知不是要重启被叫停的修身科，而是在修身科重开之前（通过公民科—笔者注）进行道德教育”⁸，但该通知表明文部省并未否定开设“德育科”的必要性。不过，伴随1947年新教育制度的实施，公民科未曾正式实施就同地理、历史等一起被融入到新设置的社会科之中，自此日本开始实施“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强调只有通过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积累生活经验才能达到培养道德品性的目的，其实质上是立足于经验主义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废止修身科、推行“全面主义道德教育”，意味着日本道德教育由学科中心主义转为经验主义。

但是，1950年11月时任文部大臣的天野贞祐强调要加强“爱国心”教育，主张恢复修身科。天野贞祐、冈野清豪、清濑一郎等历任文部大臣分别于1950年、1952年、1956年，就加强道德教育、设置“德育科”问题向教育课程审议会（以下简称“教课审”）⁹提出咨询。但他们的主张均被“教课审”否定，设置“德育科”始终未能实现。1957年9月14日，文部大臣松永东再次就加强道德教育问题向“教课审”提出咨询，其意图仍是要设置“德育科”。最终，“教课审”再次否定了设置“德育科”，但于1958年3月15日向松永东提交了特设“道德课”的咨询报告。文部省随即于同年3月18日发布了有关特设“道德课”的通知。10月1日，又以“官报”的形式发布全面修订后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其中明确规定了“道德课”及其授课内容、学时等。自此“道德课”作为一个新领域被正式列入中小学教育课程，标志着“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为主、“道德课”为辅¹⁰的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确立。“道德课”的特设意味着对设置“德育科”的否定。但是，正因为历任文部大臣反复主张要设置“德育科”，特别是1957年松永东文部大臣向“教课审”咨询设置“德育

⁸ 同上 p.249。

⁹ 1949年设置的日本文部大臣的咨询机关。主要成员为教职员、专家学者、教育相关行政机构人员等。主要就文部大臣咨询的教育内容、学习指导要领的编辑与修订、各学科教材的基础资料及教材合适与否等教育课程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向文部大臣提交咨询报告。2001年被编入中央教育审议会初等中等教育分科会。

¹⁰ 佟占新「『道德』の特設経緯-1957年度の教育課程審議会の議事録を中心に」『人間・環境学』（25）2016年 p.26。

科”问题，最终促成了“道德课”的特设。简言之，“道德课”的特设是对设置“德育科”的否定，设置“德育科”的主张却成为了特设“道德课”的重要原因。

2. 内藤誉三郎的道德教育主张

松永东主张设置“德育科”，被认为是受到内藤及由五位原文部大臣组成的“私设顾问团”（天野贞佑、森户辰男、松村谦三、清濑一郎、濑尾弘吉）的影响。¹¹内藤是推进1958年教育课程全面改革的核心人物和执行者，也是20世纪50年代主张设置“德育科”的代表人物。

2.1 内藤誉三郎其人

内藤誉三郎（1912年-1986年），1936年3月毕业于东京文理科大学，取得初级中学修身、英语科以及高级中学英语科教师资格证，同年4月进入文部省社会教育局任职。1942年8月，任文部大臣官房文书科总务科长。1945年9月进入文部大臣官方总务科任职，10月转入文书科，负责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CIE）主管教育官员的联络事务。1946年2月，出任美国教育使节团事务局业务部长，负责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接待工作。1947年3月就任学校教育局庶务科长，1949年6月任初等中等教育局庶务科长。1950年6月，任文部省第二次美国教育使节团联络员。1952年8月，出任首届文部省财务科长，负责制定《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1955年4月任文部省调查局长。1956年11月至1961年12月任初等中等教育局长，期间推进教师勤务评定、全面改革教育课程，极力主张设置“德育科”。1962年1月至1964年7月任文部省事务次官，1965年7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74年12月至1976年1月任参议院文教委员长，1978年12月出任文部大臣。¹²

可见，内藤誉三郎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任职于日本文部省，从事教育相关工作。特别是战后在文部省内担任各种重要职务，负责接待美国教育使节团、制定《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等重要事务。后又任文部省事务次官、文部大

¹¹ 佟占新「「道德」の特設をめぐる議論：その特徴と社会的背景」『人間・環境学』（24）2015年 p.19。

¹² 内藤誉三郎『戦後教育と私』 毎日新聞社 1982年 pp.222-228。

臣等要职，在战后日本教育制度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7年至1958年期间，内藤誉三郎任初等中等教育局长，是1958年推进教育课程全面改革和“道德课”特设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

内藤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在大学毕业时就取得了中学修身科教师资格证。内藤强调“战前教育的优点在于设置修身科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通过讲述圣德太子、贝原益轩、二宫尊德等历史人物的传记，告诉我们伟人的生活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等。”¹³他认为这种教授方式通俗易懂且印象深刻，并能很自然地达成教育目标。他在其自传中多次提及二宫金次郎（二宫尊德），讲述自己效仿二宫金次郎刻苦读书的经历。¹⁴可见，内藤非常认可修身科，认为修身科的存在是战前教育的一大优点。另外，内藤在其自传中称天野贞祐为“天野老师”，评价天野为有信念的“至诚之人”，表现出他对天野的敬意。并回忆天野对他也十分信任，将制定《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的工作全权交由其完成¹⁵，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内藤提到恢复修身科，加强道德教育是天野老师的信念，“我想尽可能发挥天野文部大臣的这种信念，所以在1958年修订学习指导要领时加入了‘道德课’”。¹⁶内藤的德育思想形成过程仍需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强调要加强道德教育，设置“德育科”的主张深受天野贞祐思想的影响。

2.2 内藤誉三郎的“德育科”设置主张

1957年9月27日，内藤在国会答辩中指出：“我们要为道德教育设立一个特别的时间……通过它系统地开展道德教育”。¹⁷之后重申此观点时他强调：“各学科都有其明确的教学目标，……因此各学科无法专注于道德教育，通过各学科进行道德教育是片断性的、不完整的，设置‘道德课’正是为了更系统地进行道德教育”。¹⁸由此可见，内藤认为通过各学科进行道德教育不够充分、

¹³ 同上 p. 83。

¹⁴ 同上 pp. 21-22。

¹⁵ 同上 p. 85。

¹⁶ 同上 p. 84。

¹⁷ 第26回国会衆議院文教委員会議事録第34号（1957年9月27日）

¹⁸ 内藤誉三郎「道德教育について」『道德教育実践上の諸問題』大阪教育図書 1958年 p. 32。

缺乏连贯性，需要“系统地”进行。

内藤虽使用“特别的时间”、“道德课”等名称，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仍主张设置“德育科”。1958年3月26日，他在国会上反复主张要将“道德课”改为“特别的学科”。3月31日，在文部省召开的“道德教育联络协议会”会上再次强调：“文部省将在制定学习指导要领后，尽早修订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将‘道德课’改为正式的学科”，并“考虑对副读本进行检阅”。¹⁹决定“道德课”的特设仅经过两周时间，内藤就主张将“道德课”改为正式的学科。所谓正式的学科就是要有专任教师，有经文部省审阅合格的教科书，并进行成绩评定的学科。这充分表明他对“道德课”的定位是不满意的。内藤的这种想法在其自传《战后教育与我》中有更明确的表述。他指出：“‘道德课’虽被设置在教育课程当中，但其内容是不充分的”，“本打算设置如修身科一样的学科，但因为受到强烈的反对最终只能以特设道德课这种非我本意的形式实施道德教育，甚感遗憾”。²⁰

可见，内藤对“道德课”极为不满意，因而极力主张将“道德课”改为学科。他想要设置的是像“修身科”一样的“德育科”。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只有正式的学科才是“系统的学习活动”。²¹换言之，内藤认为只有设置“德育科”，系统地开展道德教育、道德学习，才能有效地达成道德教育的目标。

内藤的主张在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德课”的特设虽然并非内藤的本意，但可以认为他设置“德育科”的主张客观上直接促成了“道德课”特设和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形成。

3. 内藤誉三郎的德育观

如上所述，内藤主张设置“德育科”，是为了实现系统化的道德教育。内藤想要实现的系统化道德教育是怎样的，其中又蕴含着他的何种道德教育观？1958年8月，他在谈及教育课程改革时指出：“迄今为止，中、小学校之间缺

¹⁹ 内藤誉三郎「『道德』指導通達の反響をさぐる」『時事通信・内外教育版』（923）1958年 p. 4。

²⁰ 内藤誉三郎『戦後教育と私』毎日新聞社 1982年 p. 127。

²¹ 第28回国会衆議院文教委員会議事録第12号（1958年3月26日）

乏连贯性、系统性。……因此本次教育课程改革重点考虑了系统性、发展性”。

²² “生活经验学习有好的一面，但……还是要系统地梳理学习（指学习内容——笔者注），在提高儿童生活能力的同时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生活中的原理”。²³ 可见，进行全面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战后一贯重视的经验主义，使学习内容系统化。

所谓系统化，一是指小学与中学之间的连贯性，也包括各学年之间的层次性、连贯性；二是反思生活经验主义学习的不足，精选学习内容以达到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内藤是要通过全面改革，使教育课程由经验主义向学科中心主义转变，以学科为中心推进教育课程的系统化。上述主张虽并非针对道德教育提出，但正如内藤所说“贯彻道德教育是本次教育课程全面改革的最重要目的”²⁴，因此道德教育的系统化必然首当其冲，成为了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课题。可以认为，内藤所要实现的系统化的道德教育，是通过设置“德育科”，按照中小学生学习认知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将精选的道德教育内容，有层次地、系统地教授给学生，建立完整的义务教育阶段道德教育体系。

可见，内藤主张设置“德育科”源于他学科中心主义的德育观。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他对“道德课”不满意。因为“道德课”并没有否定经验主义学习。相反，是对立足于经验主义学习的“全面主义道德教育”的坚持、补充和完善，仍是对学科中心主义的否定。

另外，关于道德教育的目的，内藤指出：“现在的教育课程是在被占领的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对日本民族精神的考虑欠缺。……我认为这是占领军对日本人的优点、特色理解不够所致”，“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才会被世界人民信任、尊敬。因此必须全面改革现行教育内容，培养有特点、有鲜明个性的日本人”。²⁵由此可见，内藤认为战后教育课程的关键不足在于不够重视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不能很好地培养有鲜明特点的日本人。他也明确表示此次全面教育

²² 第29回国会参议院文教委员会議事録第2号（1958年8月1日）

²³ 内藤誉三郎「改訂のねらいと主要点」『文部時報』(9) 1958年 p. 3。

²⁴ 内藤誉三郎「刊行のことば」『新しい道德教育のために』東洋館出版社 1959年 p. 1。

²⁵ 内藤誉三郎「道德教育について」『道德教育実践上の諸問題』、大阪教育図書 1958年 p. 28。

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他认为只有具有日本人的特色和个性才能获得世界人民的信赖和尊敬。这也可以解答，为何要将道德教育改革置于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位置。

培养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最重要的是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内藤强调要让学生充分了解今天的日本是如何建设起来的，现在的日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今后要如何发展等。他认为“详细讲解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有日本特色的传统文化都会成为培养爱国心的基础”。²⁶可见，系统地、充分地讲授日本历史、文化和传统等内容，最终都是要达到培养国民爱国心的目标。

“道德课”特设后内藤也不断主张设置“德育科”，培养国民的爱国心。1962年10月5日，时任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就加强学校道德教育问题向“教课审”提出咨询，“教课审”于1963年7月11日向文部省提交了题为《关于充实学校道德教育的方案和政策》的咨询报告，此时内藤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地位仅次于文部大臣。1964年至1966年期间，文部省陆续编辑发行了《道德指导资料》，作为中、小学各年级的教师参考用书，使德育内容更具层次性。值得注意的是，与195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道德篇》相比，《道德指导资料》中增加了“爱家族、爱国心”等项目。另外，内藤于1966年至1979年期间，在国会上不断强调要制定“教育宪章”²⁷，主要包括学习日本的历史，珍视国旗和国家，培养爱国精神等内容，旨在将“道德课”改为学科，根据“教育宪章”的内容制定德育教科书。²⁸其任参议院文教委员长期间，于1975年6月26日专门召开文教委员会，召集专家讨论振兴道德教育问题，商讨将“道德课”改为“德育科”，进一步培养国民的爱国心。²⁹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部省于1968年和1969年分别修订小学、初中的《学习指导要领》，进一步明确了“道德课”在教育课程中的地位。1989年，在“重

²⁶ 内藤誉三郎「座談会 時間特設による道德教育の実施をめぐる」『教育技術（別冊付録）』（4）1958年 p. 23。

²⁷ 据笔者所见，内藤分别于1966年3月28日、1973年7月12日、1974年3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1979年2月20日、2月21日，在国会答辩中多次提出要制定“教育宪章”。

²⁸ 内藤誉三郎『戦後教育と私』毎日新聞社1982年 pp. 15-17。

²⁹ 同上 p. 191。

视个性”的教育改革势头日趋高涨的背景下，文部省再次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培养具有丰富心灵和坚强意志品格的人。2002年，文部科学省向日本全国中小学免费发放道德教育资料《心灵笔记》，当时有很多学者对《心灵笔记》的制定过程提出质疑，甚至有学者讽刺它为《修心书》。³⁰ 2008年，文部科学省再次修订《学习指导要领》，新增了“以‘道德课’为主”的表述，并要求各学校任命“道德教育推进教师”。2014年，文部科学省编撰发行中小学德育教材《我们的道德》，2015年决定将“道德课”改为“特别的学科道德”，小学2018年4月、中学2019年4月正式开课。

可见，1958年“道德课”特设后，内藤在国会上反复强调制定“教育宪章”，日本文部省也不断强调要加强道德教育，围绕道德教育的论争持续至今。当然，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须与时代变化相适应，道德教育更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各界对教育质量也不断进行反思，这也是促使日本进行道德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

4. 结语与思考

战后日本道德教育，历经废止“修身科”、实行“全面主义道德教育”，1958年确立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为主、“道德课”为辅的道德教育体制。“道德课”的特设是对“德育科”设置的否定，而内藤的“德育科”设置主张却成了“道德课”特设的直接原因。³¹

内藤的“德育科”设置主张源于其学科中心主义的德育观。他认为只有在中、小学设置“德育科”，建立完整的义务教育阶段道德教育体系，将日本的现状及传统文化系统地讲授给学生，才能更好地培养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这与天野贞佑等历任文部大臣的主张一脉相承。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

³⁰ 吉田武男 『「心の教育」からの脱却と道德教育』 学文社 2013年 p.37。

³¹ 当然，促成“道德课”的特设的原因有很多，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德育科”设置主张及其反对论、“全面主义道德教育”支持论、“道德课”特设支持论及反对论等多种道德教育主张。其中既有出于教育角度的诉求也有政治性意图，战后日本道德教育体制的确立是多种道德教育主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外，1950年天野贞佑文部大臣主张恢复修身科被否定，而1958年“道德课”却得以特设，其原因与当时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等也有密切关系。该问题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日本“德育科”设置主张的背后，既有对经验主义德育观的批判和反省，更有日本政府为培养和加强国民爱国心的政治意图。“德育科”设置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也源于此。

“道德课”特设后内藤也反复强调设置“德育科”，培养国民的爱国心，文部省也不断进行道德教育改革。在此期间，文部省一方面从编撰发布《道德指导资料》到发放《心灵笔记》，再到发行《我们的道德》，完成了德育教材的制定。另一方面，在《学习指导要领》中增加了“以‘道德课’为主”的表述，要求学校设置“道德教育推进教师”，由此“道德课”的定位由“全面主义道德教育”的补充提升为道德教育的核心。通过这样的改革，最终完成了“道德学科化”。可以说，内藤的德育科设置主张对“道德课”特设之后的道德教育改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60年后的今天，“特别的学科道德”的实施意味着日本政府想要设置“德育科”的夙愿终于达成。我们姑且不谈当下日本政府推进“道德学科化”的意图何在，仅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道德学科化”代表着日本道德教育发生了质变。道德教育的形式由“全面主义”向以“德育科”为中心转变，德育观由经验主义向学科中心主义转变。

日本的道德教育改革是国内外局势转变、社会各界对道德教育进行反思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开展形式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关注和探讨国内外道德教育改革问题，分析其原因，从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内藤基于学科中心主义的德育观，极力主张设置“德育科”，想通过系统化的道德教育培养日本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那么，当代日本政府推行“道德学科化”的理论基础何在，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德育观，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特别的学科道德”未来走向如何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 安達拓二「内藤誉三郎という男」、『教育評論』(11) 1957年 pp. 11-12.
2. 大森直樹『道德教育と愛国心』 岩波書店 東京 2018年.

3. 片上宗二『敗戦直後の公民教育構想教育』 史料出版会 東京 1984 年.
4. 佟占新「「道徳」の特設をめぐる議論：その特徴と社会的背景」『人間・環境学』 (24) 2015 年 pp. 13-28.
5. 佟占新「「道徳」の特設経緯-1957 年度の教育課程審議会の議事録を中心に」『人間・環境学』 (25) 2016 年 pp. 15-29.
6. 内藤誉三郎「改訂のねらいと主要点」『文部時報』 (9) 1958 年 pp. 2-8.
7. 内藤誉三郎「「道徳」指導通達の反響をさぐる」『時事通信・内外教育版』 (923) 1958 年 pp. 3-7.
8. 内藤誉三郎「座談会 時間特設による道徳教育の実施をめぐる」『教育技術 (別冊付録)』 (4) 1958 年 pp. 8-24.
9. 内藤誉三郎「道徳教育について」『道徳教育実践上の諸問題』 大阪教育図書大阪 1958 年.
10. 内藤誉三郎「刊行のことば」『新しい道徳教育のために』 東洋館出版社 東京 1959 年.
11. 内藤誉三郎『戦後教育と私』 毎日新聞社 東京 1982 年.
12. 山崎英則、片上宗二『教育用語辞典』 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 年、p. 133.
13. 吉田武男『「心の教育」からの脱却と道徳教育』 学文社 東京 2013 年.
14. 第 26 回国会衆議院文教委員会議事録第 34 号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26/0462/02609270462034.pdf>
 (1957 年 9 月 27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閲覧).
15. 第 28 回国会衆議院文教委員会議事録第 12 号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28/0462/02803260462012.pdf>
 (1958 年 3 月 26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閲覧).
16. 第 29 回国会参議院文教委員会議事録第 2 号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029/0462/02908010462002.pdf>
 (1958 年 8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閲覧).

* 本文系海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KYQD (SK) 19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